

本社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答文学青年问



DAWENXUEQINGNIEN

I04
189
2

答文学青年问

本社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BZ64/13



B 439888

答文学青年问

本社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乾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34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736 定价：1.10元

《答文学青年问》前言

《答文学青年问》的责任编辑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，我欣然应允。

我想趁着这写“前言”的机会，发表一些小意见。近几年，我国文学大繁荣、大昌盛，作品很多，人才辈出，可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。特别是对那些想献身文学的广大青年，如何帮助他们走上文学之路，并在写作上不断地作出新成绩，取得新成就，成长为我们文学事业的生力军。我以为，有两方面的工作，我们应当去做。第一，希望出版单位，文学团体和大学中文系的专家们，编写大批有关文学知识和写作基本训练的一类书籍，供青年们阅读以提高他们的修养，增强他们的力量。苏联在二十年代初，全国曾兴起“文学热”，急需要文学入门书籍，当时专家们编写了许多读物，诸如《文学知识》、《新文学教程》等，很受读者欢迎。——其中有一些书，还介绍到中国来。当年，伟大的作家高尔基，也在这方面化过很大的力量。我们应当学习这些好经验，给青年们提供一些他们急需的知识性读物。第二，组织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们，写出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，这种切合实际而又生动活泼的书，一定会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。

陕西人民出版社呈献给读者的《答文学青年问》，正是

这样一本有益的书。

这本书中写文章的近二十位作家，都是活跃在我国文学界有成就的生气勃勃的作家。有的中青年作家，出版过大量作品，在国内外享有声誉；有的发表作品并不多，但其作品受到读者重视；有的人很年轻，写作时间也不长，他们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这些人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？他们的文学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？他们是怎样工作的？怎样学习的？怎样思考的？总之，他们的生活历程和文学历程，都是热爱文学的青年们极为关心，希望知道的。

我粗略地读完了全部文稿，觉得大多数文章热情、亲切、感情真挚。他们对读者诚恳坦率，直抒胸臆。他们走过的艰难道路，个人生活中的遭遇，以及文学创作中的成功或失败、喜悦和痛苦，都一一写出来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这样以来，作者和读者心碰心，建立起一种感情的联系。这种联系是很可贵的。文学是人学，文学是情学。文学作品，要以情动人，写这一类文章也不例外，也是要以情动人。其中有的好文章，可算作富于诗意的散文，而富于诗意的散文是有价值、有生命力的。我就是通过这些文章，对熟识的作家理解更深了，对不相识的年轻作家，也有所了解并建立了友谊。

上边说过，这书中写文章的人，有些是文学界有名望的人，有些是初显身手的小青年，他们不仅把自己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呈现在我们面前，特别可贵的是，他们把近几年在文学上努力追求的种种情况，也仔细告诉我们。这就是说，在我国文学的新时期，他们对现实生活如何思考，艺术方面如何开拓，以及有什么新收获，有什么新成就，有什么新见解，有什么新苦闷，有什么新困难，有什么新追求，都

一一向我们介绍。这样的文章人们乐意读，因为它能给人以启发，能让人思考，能激发起人们的创造热情和奋进力量。

中国农村有广阔的天地，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。过去，我们依靠农民取得了政权。建国后三十几年，我们国家走了曲折的路，受苦最深最大的是农民。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农村变化最早也最大，这是值得搞文学的人深思的。作家们应当时时关心中国农民的命运，大力在作品中反映中国农村大变革。这本《答文学青年问》编辑出版，似乎也有这番意思：鼓励大家从文学的角度重视农村的广阔天地。你看，这本书中写文章的作家，不管是天南海北的人，不管是在文学中以哪一方面的成就见长，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在农村，生活在变革的第一线。他们的作品大多数以反映中国农村的变革，以及变革中人们的生活，心灵和新时期新的人际关系为主要题材。他们手下的作品：不管是长篇、中篇、短篇或散文，都充满了泥土气息，都为新时期的文学带来新成果和新经验，这是很可贵的经验，——它会鼓舞后来者。

我国新时期的文学，虽然有了大发展，可是，距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相差很远。这就需要有很多人走向文学岗位，只有人才大量涌现，才能有强大的文学后备军。这就是说：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作家，出现更多的好作品，繁荣我们的文学事业。同时，也应当看到：我们深刻反映农村改革面貌的作品还不多，写中国农民命运史诗式的作品就更少了。面临的任务很艰巨，需要我们长期努力奋斗。

写这篇短文时，正是盛夏，西安奇热，只是这则短文未能写好，是不能责怪天气的。

1986. 7. 西安

□ 目 录

前 言	杜鹏程 (1)
我是怎样迈进文学门口的	浩 然 (2)
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	刘绍棠 (14)
我的台阶与台阶上的我	贾平凹 (20)
我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	何士光 (34)
土壤与收获	古 华 (42)
创作与生活	韩文洲 (48)
愿生活美好	王润滋 (66)
答文学青年问	陈忠实 (72)
跟着生活探索	成 一 (88)
我的自传	邹志安 (96)
在泥土中开一束野花	王 蓬 (106)
文学——真诚的事业	彭见明 (122)
“一溜烟儿去了……”	京 夫 (130)
风情·人情·感情	赵 熙 (138)
这里有三尺厚的黄沙	赵本夫 (146)
炎帝陵前，一位“游乞僧”的沉思	谭元亨 (164)
虽然艰难，但我怀念	王宝成 (178)
农民，我的太阳	郑彦英 (186)
我从这乡村小路出发	林 宏 (192)

〔作者简介〕浩然，原名梁金广，一九三二年生，河北蓟县人。先后担任县、区基层干部，《河北日报》的记者，《红旗》杂志编辑，现为中国作协理事，北京市专业作家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喜鹊登枝》，长篇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等，近作有《浩然选集》三卷。

我是怎样迈进文学门口的

我与文学不应该有任何缘份，尤其不可能以文学为职业。

旧中国是贫穷落后的，旧中国的农民最穷最落后。父母被贫困这个魔鬼从农村给赶到煤矿，我降生在一个大粪场子的窝棚里。父母都是文盲，亲朋也少有识字的；我在入学之前，几乎没见过一本书，——我家连年历都不买。我时时刻刻闻着大粪气味、热汗气味和煮野菜的气味，无处接受那种高雅的文学熏陶。

应当庆幸的是，我在幼年时期，不知不觉中从民间文艺的泥土里吸取了一些营养，才使意识领域里获得星点的“艺术细胞”。先是被母亲讲述的神鬼妖狐，善恶报应的故事传说迷住了，继而因搬进穷人聚居的街上，跟穷唱戏的为邻，他们的孩子常带我钻进戏园子里去，又被地方戏曲所吸引。父亲死后，母亲把我带到蓟县农村的舅父家，每年春天能去邦均镇逛两次庙会，秋后能去邻村瞧几夜驴皮影，这都给我不小的影响。在煤矿我念过三年小学，迁到农村上了半年私塾，识了些字；在寂寞难熬的时候，就把左邻右舍妇女们夹花样、丝线用的旧书借来，津津有味地阅读，得到很多益处。……

母亲一死，我这孤儿就顶门立户地过起庄稼日子，天经地义地得当一辈子农民。尽管我是个极富幻想的农村少年，但是生存在偏僻山村的环境中，连报纸都不曾见过，更不知道社会上还有一伙专事写文著书者，所以也只能幻想发财、或是到唐山瓷器厂学个画匠，做梦也梦不到将来搞文学、当作家。

革命的风暴，把我卷进解放旧中国、建设新中国的队伍里。一九四九年《河北青年报》创刊，每个青年团干部都被派为通讯员，这使我第一次知道：我们农民和农村干部，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和自己想说的话写成文章，登在报纸上给别人看。于是我便象小孩子学步那样，绊绊磕磕地写起小消息和小通讯来。第二年，我到蓟运河边的七区工作，主要任务是生产救灾。为了宣传、发动群众，区委领导让我编个小戏。我憋了两天，开了一个“夜车”，终于编写出来，戏名叫《姑嫂拾棉花》。没有女角，我就扮演戏里的小姑子，登上在集市中心搭的台子，敲锣打鼓地演唱起来。我亲眼看到群众对我们表演的热情欢迎和收到的宣传效果，就长了精神有了瘾，又一连气主动地写了好几个小戏。这时候的写作动机尽管一半出于任务观点，一半出于个人的兴趣，但我毕竟大胆地尝试了文艺创作，爱上了写作活动。

冀东这块地方遭受多年的战争蹂躏和洪水冲淹，大地赤条条的，极少见到树木。政府号召绿化，却因大部分农民眼光短浅，不愿干这种不能马上得到利益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这个区光有号召，而没有行动，各级搞领导工作的同志都挺着急。有一天我从乡下回区公所，突然瞧见镇子外的大坑边沿新栽上一片小树，心里特别高兴；跑到镇公所一打听，才知

是妇女主任带领几个妇女积极分子刚栽上的。我觉得这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人做出的新事儿，应当表扬，连夜赶写了一篇通讯。不久这篇稿子发表了，立刻轰动了全区。因为这是这地方的名字头一次“上了报纸”。镇子的领导召开群众大会，宣读那篇通讯，鼓动人们都向几位植树的妇女看齐。一散会，青年团、民兵队，还有农会、商会全都陆续行动起来，抢着在公共的空地上植树造林。周围村庄的干部，也用那篇报道发动群众：“咱们也干点成绩来，让浩然给咱们上一篇，扬扬名！”一篇小小的文章，对群众起到这么大的鼓舞作用，对革命工作起到如此明显的推动作用。这使我惊喜异常，不由思索了许多不曾思索过的问题，觉得笔杆子真重要，真应当学会掌握它。第二年春天，我在保定省团校学习，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把我的实际感受提到新的理论认识的高度：文学，是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，打击敌人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。这是多么庄严伟大的事业，我要拿起这个武器，干好这个事业。由此开始，我有了个人的具体理想：争取当个作家。我把一切时间都利用起来，写诗歌，写故事，亲自抄录在乡间的黑板报上，或者爬到大树上的广播台上，用土广播给群众朗诵，以后练习写小说。

这是我投奔文学之门的的第一步，一个农民的后代、“半文盲”的基层干部大胆地拿起笔来，唯其有了这一步，才可能有以后的两步、三步，直到今天。

建国初期，即五十年代，各条战线成长起一大批文学青年，如今已经成为我国文学队伍的主力，我和他们有着鲜明的共同点，即不是单纯为了成名成家而搞文学的。我们首先看到文学的社会作用，而爱上了这个事业；我们把文学作为

革命手段，而决心跨进它的大门，成为它的主人。这是我们一直保持着不衰败的勇气和信心，走过三十年艰辛路程的前进方向盘和力量源泉。

二

今天是从昨天、前天走过来的，回顾身后漫长的一串脚印，哪一个不塞满着艰辛、困惑、苦恼和焦灼，以及为克服这些撒下的汗水和心血呢？

万事开头难，文学的大门口不是只凭着个人的热情、喜好和愿望，一抬腿就轻易迈进的。当时的我，文学修养和造诣都等于零，文化水平只能算粗通文字，而且是个十七岁的孩子。我怀上了被认为是我这种人高不可攀的理想，而且决心要达到目的，这就急需各种知识来武装自己，打下起步的基础。可是我既没条件进文科学校深造，也不可能脱离工作岗位自学。我只能把文学当成业余的事情来做。

我为了给进入文学创作做准备，要在业余时间补习的东西实在太多，而在医治战争创伤、恢复国民经济时期，繁忙的基层干部工作，日夜在农村第一线滚，连剃头的 时 间 都挤不出来，哪里有什么“业余”呢？当时我就清楚地看到：这样的客观环境，个人无法改变，但是可以利用，——顺应着环境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，为实现我的理想服务；就好像不论是砖头、石块，还是土坷垃，都拾拣起来，积少成多，铺垫成一条向前移进的路。

当时，党组织为了改变县区干部大多数是文盲，不适应工作发展需要的状况，在县城设立干部业余文化学校，在区公所配备文化教员。我觉得这是个可利用的条件，于是就积

极报名参加业余文化学校，并且认真地听课，写作业。在县里工作的时候，每天早饭前上语文课，晚饭后上算术课；中午别人歇晌，我做练习题。调到区里，我跟文化教员摺在一起，缠住他不放，非把课文搞明白为止。下乡的时候，我走到哪儿，就把课本带到哪儿，坚持自学；遇着弄不懂的问题，就找村里的小学教师和跑校的中学学生请教。这样的学习，我从一九五〇年坚持到一九五四年六月被调到《河北日报》当记者为止，语文课学到高中课本，数学学到代数。这以后我虽然不上业余文化学校了，仍继续坚持文化知识自学，补大学课程，学中国文学史，按历史的顺序研究古典文学作品。一九五七年我已正式发表小说了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北峰窝休养所养病的时候，我还跟几位印刷工人病友，组织了历史和地理学习小组，一块阅读、讨论，互当教师。利用这方面条件学习的结果，补上了因幼年失学而造成的基础知识空白；而这些知识，则是一个搞文学的人所不能缺少的。

在八年的基层干部生涯中，我曾经一次被送到党校、两次被送到团校学习政治理论。志在搞文学的人，常常对政治理论轻视，甚至厌烦。我头一次在党校学习的时候，就很不自觉，马马虎虎地应付差事，熬时间。以后的两次在团校学习，我觉悟了，渐渐地认识到文学是写人的，反映社会的，表达一定的政治思想的，作家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，才能把握人物，认识社会。所以我不再认为进政治理论训练班是浪费时间，而是把文艺书籍和稿纸全都收起，专心致志地利用这样的机会学习政治理论，补上这重要的一课。一九五二年在省团校学习的时候，除校方开的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

学课程以外，我还用课余时间读了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等哲学和政治入门的书籍。这样，我安心愉快，有了长进，学校领导也满意；我还被评为学习模范，当了学习组长。

作为农村的基层干部，本业就是下乡搞“中心工作”，除了开会之外，很少有时间住在县城和区公所。而下乡的时候，多以小组为单位，如果你不积极抓工作，只是抱着书本看，或是总想趴在桌子上写，分担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得好，没法交差，甚至会出乱子，同组的同志也会反对。为此我曾经极度的苦恼过，觉得时间全被“中心工作”挤掉，没头脑没止境，文学理想何以实现？学习了毛主席的“讲话”，明确了现实的火热斗争生活是文学创作素材的源泉，只有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，创作素材才能够有所积累。于是，我就来了个“因利就便”，一心扑到我所担负的工作上，从被动到主动，从单独啃书本或扎到安静角落写作，到跟本组的同志打成一片，走家串户、下地干活跟农民打成一片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工作质量提高了，与同志们团结了，跟周围的群众关系密切了，自己明显地充实起来了，不仅使我在当时写作起来成为有米可做的巧媳妇，练习起来顺手，进步快，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生活素材，在蓟运河边青甸和太和两个大洼搞中心工作的那段紧张繁忙的日月，给我打下相当厚实的生活底子，几乎能够享用一生，二十多年后我写作《金光大道》，多数的人物、情节和故事都是从那一阶段生活的储蓄折子中提取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由于亲自参与了，动手了，也动了心，所以对接触到的事物就有感情，理解透彻，印象强烈，对那些有意义的人与事，永远不会忘记。例如“刘祥”土改分了

土地，由于穷根没有拔除，抗拒不了天灾人祸，种子都撒不到地里去，这正是我们当年搞“中心工作”时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。我到了他家，看见炕上的病女人，看到炕下一排瘦弱的孩子，看到他那愁苦的面孔，我差点掉下怜悯的眼泪。我不顾一切地为他跑种子，借工具，动员别人跟他搭伙，并亲自给他们拉犁播种，我和他们的汗珠一同流进泥土里。这种事遇到许多，虽没做一字笔记，但不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一谈论“土改以后……”，我的脑海立刻便浮现出那些真切的情景，就忍不住地激动；在描写这些的时候，则特别顺利、特别得意，是一种特别的享受！我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，再不以下乡搜集材料为满足，不论是当新闻记者，还是以专业文学工作者身份去体验生活，都尽可能在所到之处如当主人，伸手做事情，用这方法容易深入人心，获得最真切的创作素材。

人们说，有志者当为时间的主人。我想，除了紧紧抓住象河中流水一样容易消逝的时光之外，也包括巧于利用能提高自己本领的各种条件。

三

文学工作是高度的脑力劳动，是极复杂的一门社会科学。有志者必须首先有“自信”为主心骨，有“持之以恒”的刻苦努力为保障。文学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般的线路供我们照着走，得靠自己勇敢顽强地踩出来。这门学问的高峰是没有绝顶和止境的，写一辈子，就得不停歇地攀登一辈子！

我刚拿起笔练习写作的时候，确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。之所以不怕，并非有降虎的本领，而是不知虎的厉害。后来渐渐地临进了门口，方知入门之难、路程之长、

攀登之艰巨，方知象我这样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要达到理想的目的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很可能落个冲闯半生，一事无成，后悔莫及的结果。对一个在各方面都有发展前途，朝气蓬勃时期的青年来说，还有比预料到可能走错路而徒劳一场的结果更可怕的吗？而当时，我那一点小的聪明和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已被领导重视，正在培养和重用我，只要我一心务“正业”，会不断受到提拔，这样走不仅路子顺当，尤其能满足年轻人很难不染的虚荣心。

我经过思想矛盾和斗争，终于没有被看到的那个可能失败的“结果”所吓倒，没有怀疑自己是个搞文学的材料；认定只要把劲头使对使足，我就能够成为文学大厦上的一钉一椽、一砖一瓦。恰恰相反的是，尽管“领导者”的“位子”我随时可坐，却深知自己不是那块料，起码我那好感情用事、易冲动的弱点难以克服，就没法指挥人，没法抓政治运动。等以后入了文学之门，更有了一个明确的看法：凡是有当官瘾的作家，都不会写出好作品。

我对文学的自信心，在开始阶段是从已经成功的同时代人身上吸取。比如，兵写兵运动涌现出个高玉宝，使工农兵中间的文学青年很受鼓舞。当我知道了高玉宝的根底之后，暗想：高玉宝学写东西，连字都不会写，得画符号代替，得求别人代笔；我比他强，不会写的字会查字典，能自己执笔；那么他能成功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成功呢？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小说家胡万春、诗人李学鳌、更是我的学习榜样和追赶目标。那时候我们还不相识，但我暗暗地跟他们比赛。我向来不嫉妒人，包括同时代的人，可也不甘心落在同时代人的后边。为了追他们，就设法了解他们，学其长，避其

短。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差，但凡是新作者出的书，不吃不喝也得买到手，而且认真阅读，珍惜保存。同时代人的成功，不仅使我增强了信心，也使我吸取许多营养，提高和充实了自己。

我对文学自信心的另外两个源头，一是广大农民改天换地的新生活的鼓舞；一是报刊编辑部编辑同志的热心鼓励和帮助。置身在欣欣向荣的农村里，置身在纯朴、勤劳、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农民中间，被美好的事物包围着、冲动着，忍不住想对别人宣扬和赞颂；怨自己拙笨，促自己练笔，一分一秒时间都觉得是宝贵的，哪容得下一丁点“失望”和“松懈”呢？编辑部的同志没嫌我拙笨，而是由衷地爱护，千方百计地坚定我的信心，帮助我提高写作能力。第一次进北京城，第一次进编辑部看望编辑——《中国青年报》的唐飞虎同志，我没给他带点礼物，倒是他牺牲了星期天的休息，陪我到先农坛看一场苏联红军歌舞团的演出，尔后，由他掏腰包，请我下馆子吃了一顿肉丸饺子—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首都的餐馆——这种深情厚爱，怎能不给我以信心和力量呢？

搞文学创作是艰苦的事情，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化知识“先天不足”的人则更加艰苦。我当时没有怕苦，常想三件事：想革命前辈，学习写作能比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打江山更艰苦吗？想农民父老，学习写作能比他们在风雨烈日下干活更艰苦吗？想我幼年时候读《三字经》结识的几位古人；古人为了做学问，那种“头悬梁，锥刺股”的顽强毅力，使我深为感动；我今天学本领赶上了新时代，没有电灯，公家花钱给打煤油，用不着“囊萤映雪”，优越性大多了，何有苦言？